

# 龙大道艰苦朴素二三事

陆景川



►1930年4月金翊群(左)、龙大道(右)夫妇和父亲龙治藩合影于上海。

## 工作期间自备干粮

1924年,龙大道受党组织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这里,他接受了更为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1926年回国后,龙大道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他深入工人群众之中,多次组织发动罢工斗争。他态度和蔼,没有架子,总是以普通党员身份,深入车间、作坊和店铺,和工友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对工友疾苦十分关心,工作深入细致、认真负责,工友们对他十分敬佩,听了他的讲话,心里总是“豁然亮堂”。上海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徐梅坤曾深情回忆说:“我对大道的印象很好。他生活艰苦,对党忠诚,严于律己,对同志热情诚恳,对工人疾苦十分关心。不论做什么工作,他态度始终是积极认真的,和同志们关系也相处得很好,在工人中间威望很高!”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期间,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上海80万工人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龙大道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起义胜利后,龙大道任上海总工会经济斗争部部长。其间,龙大道始终坚守在罢工斗争的最前线,为工人们出谋划策,训练武装,把握方向,鼓动拼杀。在工作中,他总是携带“干粮”,肚子饿了,就啃几口窝头充饥;身体累得扛不住了,就在厂房草地上躺一会儿。即便在上海总工会里工作,龙大道睡的是公用帆布床,盖的也是一床薄薄的被子。当时党的活动经费紧张,同志们们的生活都十分艰苦,有时甚至需要两个人一天共吃一份饭菜。当基层工会送来食品时,龙大道总是坚持“让工友先吃完,自己才动嘴”的原则,有时饭菜不够,他干脆把饭菜让给其他同志,自己用煎饼或番薯充饥。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龙大道多次前往先施公司指导工作。先施公司是当时上海的“名牌”

公司之一,位于热闹繁华的南京路,工人不仅人数众多,且觉悟比较高,是罢工中的骨干群体。

一天,龙大道又来到先施公司,向工友们宣传动员。他对工友们说:“工人群众不仅是罢工斗争的依靠力量,而且更是自己的患难兄弟。”博得了在场听众的热烈掌声。

从先施公司出来已过中午,龙大道听说一位积极分子因为热心工会活动,经常不回家,和妻子闹得不愉快,于是不顾饥肠辘辘,和工会成员赶往该工友家中调解。穿过一个小巷,拐进狭窄的里弄,龙大道来到了工友家门口。一进门,只见那工友的妻子正在埋怨工友只顾厂里不顾家,家里已粒米无存,揭不开锅。龙大道急忙进门劝解,又从口袋里掏出自己仅有的一块大洋,交给工友,说是工会发的补助,让他马上去买些米面。

离开工友家,龙大道和几位工会成员回到厂旁边的一处稀粥摊前,伸手往口袋里一掏,把自己剩下的铜板全掏了出来,请大家喝粥,自己却推说有事离开。等下午工会成员回到厂里,却发现龙大道坐在桌前,桌上摆着他随身带着的一小包香豆,正就着一大缸子开水一粒粒“津津有味”地吃着。

罢工斗争胜利后,先施公司工会为了感谢“上总”和龙大道的领导,派工友代表们买来许多吃穿用的纪念礼品要送给他。龙大道见状,既惊讶又感激,他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十分动情地说道:“工人弟兄们的盛意,我心领了,但作为‘上总’的干部,带领大家同资本家斗争是我们的职责,大家用不着感谢。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凝成一条心,我们的斗争就一定能够继续胜利!不过,对于工人兄弟们,我只能服务,只能付出,而绝不能收礼!在这里,我借花献佛,就将这些纪念礼品捐赠给大家,以表达我对这次罢工斗争胜利的祝福!”工友代表们深受感动。

# 新四军“挖心”破敌

贾晓明

行而来的警卫排以及先期转移至白马山的黄陂梅店自卫队和潢川、息县的十几个党员、青年合编为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划归新成立的中共罗(山)礼(山)(黄)陂孝(感)中心县委领导。

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在竹沟成立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并任命司令员,率部南下发动群众组成抗日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在白马山龚家湾正式成立。全大队共100余人,分编为两个中队,罗厚福任大队长,熊作芳任政治委员,廖毅任政治处主任。3月,六大队与李先念率领的豫鄂独立游击队在信(阳)罗(山)边九里关狮子口会合。根据李先念的建议,六大队旋即挥师南下前往鄂东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并积极联系独立游击第五大队互相配合行动。

5月,中共鄂东地委成立,由程坦接任鄂东地委书记,六大队随即归属鄂东地委领导。此时,五大队三中队西征到波孝边并在孝感县青山口以南与六大队会合。程坦针对新四军鄂

## 给妻子搭“帐篷”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肆意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龙大道受党组织指示到武汉从事工人运动。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时任上海总工会常务委员兼经济斗争部部长的龙大道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了会议。6月,他率团参加在武汉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在会上报告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经过。会后,组织上留他在武汉工作。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武汉的各级工会组织和进步团体被查封占领。当时,汉口硠口区是全武汉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为挽救工人运动,党组织立即安排富有工人斗争经验和组织领导能力的龙大道担任硠口区的区委书记,领导工人群众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当时,龙大道受中共湖北省工委委员向警予的直接领导。向警予曾把一个箱子存放在龙大道家里(内有党的活动经费500多块银圆),并指示龙大道“可以按情况灵活运用”。

时值8月,酷暑难耐,龙大道的妻子金翊群患病在床,恰好龙大道家中有一部旧电扇,可用来给金翊群解暑。一天下午,中共湖北省总工会宣传部主任林育南来到龙大道家里联系工作,说印刷工作需要一台电扇降温,希望龙大道批给经费。龙大道当即把自己的电扇拆下来让林育南带走。林育南见金翊群患病在床,表示自己和同志们还可以坚持,坚决不要。结果,龙大道亲自把电扇给送了过去。

两天后,向警予来联系工作,见金翊群大汗淋漓,龙大道拿着蒲扇在一旁扇风,便问起电扇的去向。龙大道说:“我们熬一熬,就过去了!”向警予听后,当即让龙大道从经费里拿出钱去买一台电扇,可龙大道是不肯,还说“公款只能用在革命事业上,我们有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挪用它”。看到金翊群痛苦的表情,向警

予便“命令”龙大道立即拿出钱来去买电扇,还亲自从箱子里拿出8元钱交给金翊群做伙食费。龙大道表面上点头答应,等向警予一走,就把钱放回箱子。几天后,有同志来联系工作,发现龙大道并没有买电扇,只是在妻子病床上搭了一个简易“帐篷”,为妻子遮挡骄阳。

## 为了省钱,让别人“跟着受累”

1928年3月,龙大道返回上海。4月,他被中共中央派到宁波,任中共浙江省委工部部长;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代理书记,在杭州主持省委领导恢复改造各级党部,加强浙西、浙南党的领导,仍任省委常务委员兼工部部长,前往各地检查指导工作。

12月,中共中央调龙大道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上海市各界人民自由运动大同盟主席、党团书记。1929年2月初,龙大道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奉命前往安徽六安开展工作。

龙大道在中共潜山县特别支部书记王效亭的陪同下,从安庆出发前往六安。本来组织上考虑到当地境内山脉纵横、交通闭塞,特别拨给经费,批准两人雇轿。但龙大道向来节俭,根本舍不得花钱,主动要求与王效亭徒步前行,王效亭欣然同意。

两地之间有数百里之遥,为了隐蔽,王效亭选择数量走崇山峻岭间的野径山道。当时已是寒冬季节,山间冷风呼啸,积雪三尺。两人出发后,为了尽快赶到目的地,一天走三四十公里路。王效亭是当地人士,走惯了山路,在前面大步流星。龙大道双脚很快就起了泡,他咬着牙前进,终于走出了百里大山,到达了目的地。龙大道一面将省下来的费用交给当地党组织,一面满怀歉意地对王效亭说:“为了省几个钱,让你跟着受累了。”

王效亭极其赞赏龙大道的节俭精神与执拗毅力,笑着对龙大道说:“老龙呀,这一行我算开了眼界,你这个‘吃苦大员’,不光手紧抠门,还这么吃苦耐劳,你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作者单位:贵州省文史研究院)

伪军官兵正在熟睡,被新四军战士们叫醒后全部乖乖投降。驻村外的伪军一个团听到消息仓皇溃逃。拂晓战斗结束,据统计,新四军共计俘伪旅长1名、团长3名及官兵900余人,缴获迫击炮3门、重机枪9挺、长短枪500余支。遗憾的是,当夜李汉鹏设在司令部,侥幸逃脱。

7月7日,第六大队和第五大队的两个中队再次联合作战,从黄陂北部的黄门冲出发,夜袭盘踞于孝感的伪八军赵光荣部,俘其旅长以下官兵200余人,余部溃散。消息传出,横行于泡桐店一带的伪八军尹昌彦吓得一哄而散,伪八军全覆灭。伪生军李长鹏只身逃走,从此靠打铁为生。

这次战斗的胜利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打开了蔡店、梅店地区的局面,为进一步开辟鄂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9年8月,六大队发展到800余人,并收复了被敌伪占领的大片国土,抗日根据地迅速建立和扩大。与此同时,六大队还派出一批干部深入罗山、礼山、经扶(新县)、光山等抗战后方,分别设立了办事处、留守处,发动群众,联系社会开明人士及国民党军政人员中的爱国人士,组织统一战线壮大抗日力量。9月,六大队和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二团队、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在罗(山)礼(山)边大小鸡笼山联合组编为临时支队。

# 解方:“兰州事变”的关键人物

王贞虎

1936年12月12日,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东北军五十一军在兰州响应张、杨两将军的爱国义举发动了“兰州事变”。中共地下党员、时任五十一军军参谋处(侦察科)中校参谋的解方在“兰州事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兰州事变”前,解方长期在东北军中秘密从事党的统战工作,是张学良任会长的“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负责人。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凌晨,解方收到张学良的密电,电文大意是:解与杨(虎城)主任合作,已经扣留蒋介石和与会的中央军将领,并发表通电,提出“八项救国主张”;命令五十一军立即采取行动,解除驻兰州所有“中央军”的武装,扣留主要党、政、军、警人员,断绝国民党绥靖公署与外地的一切联系,同时,发表声明,拥护“八项救国主张”。

当时,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和三个师的师长都在西安参加军事会议。解方立即将张学良的电报送给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忠干。在解方的策动下,上午10点左右,五十一军军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宣读了张学良的电报,军、师参谋长们统一了“坚决干”的思想,并在解方的参与下,研究制定了落实电报的各行行动方案。

晚8时,五十一军军部大开宴席,兰州绥靖公署首脑及处处长(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在西安)均赴会。正当酒酣耳热之际,忽然冲出一队全副武装的士

兵,将在场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全部扣押。与此同时,五十一军各部按计划发起行动。一一三师的三个团长中有两个已被解方发展为“抗日同志会”的会员,师参谋长与解方在日本有同学之谊。该师行动迅速,不久便占领了中央军兵营、飞机场、电台、报馆、银行等地。

“中央军”第三军炮兵团团长是解方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经晓以利害,该团立即放下武器。邓宝珊新一军的部分军队“保持中立”并“借道”给一一三师攻打“中央军”。

兰州绥靖公署警卫队被五十一军部队击溃后,解方与军通信营营长冯梦瑞、通信科科长李翔云立即冲进了朱绍良的办公室,缴获了电台和大批重要档案文件。

13日拂晓,城内外枪声渐渐停止,五十一军各部陆续上报完成任务的情况:驻兰州附近的国民党中央军及其警察、特务武装均被缴械。这时候,解方一面代表五十一军对软禁在“励志社”的国民党党、政、军、警人员及被缴械的官兵进行宣抚,一面及时地建议以五十一军和甘肃省政府的的名义发出拥护张、杨两将军“八项救国主张”的通电,并将“兰州事变”的情况报告张学良。

“兰州事变”的发生不但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势,也在甘肃省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兰州事变”爆发后,连日里,在解方等的安排下,兰州召开了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掀起了兰州救亡运动的高潮。

# 一场特殊的战斗

杲学军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九军从福建晋江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向厦门以北的沃头、刘五店、集美地区攻击前进。集美镇位于集美半岛的最南端,同厦门岛隔海相望。这里是爱国侨领陈嘉庚的故乡,他在镇里投资兴建了巍峨壮观的集美学校。国民党厦门战斗打响前,驻守集美的解放军第一团已在集美镇内的学校建筑内修筑了坚固的碉堡群,并在美人山、天马山上设立支撑点,另派飞机从空中支援,企图以此阻挡解放军的前进。

21日凌晨2时,二十九军八十五师对集美镇外围发起攻击。上午,八十五师二五三团二营、三营分别攻占了潘涂、美人山、天马和英雄头,控制了集美镇北部;一营于22日拂晓占领了孙厝,进入集美镇南部的狭窄地带。因地形不利,一连在追击中遭到敌人反击,同敌人形成对峙。下午5时,二五三团组织炮火向敌人轰击,掩护一连二连向西面,三连从东面向敌阵地突击。一连二连攻击顺利,三连遭到敌人顽抗,连续攻击均未奏效。到23日拂晓,由二营四连接替三连将敌人击退。二五三团遂进驻集美镇外。

早在八十五师向厦门进军途中,就接到上级转来周恩来的指示说,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办有集美学校,多年来广育人才,驰名中外,要我军尽力妥善保护,严防破坏。

八十五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把此作为严肃的政治任务,及时向部队作了传达布置,提出了明确要求。当二五三团

在集美镇外作战时,敌人一个炮阵地就设在集美学校附近连续向我军射击。为了防止损坏集美学校,我军没有组织炮火对其还击。

23日上午,三营正面攻击集美镇,二营向集美码头迂回。到下午3时,二五三团全部占领该镇,完成了周恩来副主席交给的任务——民宅、集美学校校舍全部完好无损,居民、师生无一伤亡。当日傍晚,二五三团政治处主任张茂勋找到集美学校负责人,告诉他周恩来的指示,以及陈嘉庚正在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情况。当天夜里,解放军还组织干部战士帮助学校转移重要设备,疏散教职员工及其眷属,预防敌机轰炸和敌炮袭击。不久,八十五师司令部、政治部还以师领导的名义,贴出了保护集美学校的布告。布告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八十五师司令部、政治部布告**

查集美学校为华侨民主人士陈嘉庚先生所创办规模较大之学校,希我各部队人员应尽量不(必)进该校,并坚决予以保护,严禁搬移或损坏该校一切教育用具及房屋、树木,仰各切实遵照为要!

此布

师长朱云谦副政委宴成山(政治部)主任朱群

厦门解放后,11月1日,八十五师政治部准许学校自行运回仪器、图书等,并接回滞留的教职工及其眷属、学生等,准备开学正式上课。

# 一面奖旗背后的战斗故事

韩虹

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战场上赢得了一系列胜利。为进一步消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民主联军将攻击目标锁定在当时的东北军事重镇——四平。一纵二师四团一营的指战员听到消息后,个个摩拳擦掌。该部多次向上级请战,要求把攻打四平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他们来完成,得到了师首长的批准。

四平是一座敌人永久设防、明碉暗堡无数、工事极端复杂的堡垒式坚固城市。战斗打响前,师首长特别对一营进行了动员,并告诫指战员:“敌人就是铜墙铁壁,也会有针眼可钻!”根据师首长指示,营长范鲁带领着各级指战员,一次次深入前沿进行实地侦察,选定了突破的“针眼”。

战斗打响了,一营挑起了突破四平的主攻任务。该营尖刀连二连最先冲向敌阵。守敌阵地内顿时喷射出雨点般密集的“火舌”,二连战士毫不畏惧,机动灵活地向前冲锋。不久,空中飞来敌机,疯狂地向战士们轰炸、扫射,不少战士倒在血泊中,冲在前的副营长也牺牲了。连指导员王崇华见状立即站出来接替副营长指挥战斗。他带领战士们在火海弹雨中穿梭,逐渐接近了敌人的阵地。

与此同时,三连也投入了战斗。在

三排长史德洪的率领下,30多名战士突破了一道道铁丝网,爬过交通壕,沿途消灭了明、暗堡里的守敌,很快接近围墙。围墙上的守敌拼死抵抗,子弹暴雨似地倾泻下来。史德洪一面指挥战士向墙上敌人射击,一面带领战友用铁锹在城墙上挖出脚踏坑。七班副班长张志年抱着炸药包,顺着脚踏坑向上爬去,在堡内和围墙的结合部实施爆破。随着一声巨响,碉堡被炸毁。史德洪大喊一声:“冲!”战士们趁着烟雾冲上围墙率先突入四平城。

看到史德洪排打开了突破口,一连连长刘树仁立即带领一营后续部队跟了上来。他们一鼓作气冲过内壕,打退了顽抗的敌人,占领了城里临近突破口的房屋,巩固了立足点。不久,一营全营相继攻入城内,并向纵深发展,与城内守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接连攻占了守敌阵地。战后,为表彰一营全体指战员在战斗中的突出战绩,上级授予他们奖旗以示鼓励。

1948年3月,一营的英雄们擎着这面光荣的旗帜,又参加了解放四平的最后一战——四平收复战,并再次承担起主攻突破的任务。3月13日,在历经23小时的勇猛作战后,这支英雄的部队同兄弟部队一道彻底收复了四平,四平人民从此获得了新生。



1938年10月下旬,鄂东地区沦陷后,驻守该地的国民党军溃退,国民党“第四战区鲁豫皖游击支队混成旅旅长”李汉鹏投靠日军,所部被日伪改为伪“人民自卫军”第八军。李汉鹏趁机收罗散兵游勇,队伍很快扩大到4000余人。这股伪军盘踞在黄陂蔡店一带,在当地搜刮民财,欺压百姓,当地人民深受其害。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原局,直接领导和指挥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工作。12月底,新任中共鄂豫皖边区党委书记郭述申由延安去皖西途经白马山期间,向中共鄂东特委和留守处人员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并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决定以留守处警卫排为基础,加上由竹沟随